

# 大學周刊

2010年1月5日 周二出版 第456期 编辑部电话：010-82614599 电子邮箱：dxzkzbx@163.com daxue@stimes.cn

## 就业歧视何时休

卫生部近日宣布，我国将于近期出台有关政策，取消入学、就业体检中“乙肝五项”检查，明确禁止将携带乙肝病毒作为入学、就业的限制条件。长久郁积的乙肝歧视问题传出“破冰之音”。

其实，乙肝歧视仅是就业歧视的冰山一角。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就业歧视由来已久。在大学生就业难的当下，人才的供给大于需求，招聘单位处于“买方”地位，留给就业歧视很多可能的空间。诸如户籍、性别、年龄、身高相貌甚至婚姻状况都可能成为应聘者被歧视的由头。在当下大多数的招聘信息中，“具有相关工作经验”也成了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事实上这也是一种歧视。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就业歧视是不被容许的，公平就业，反对就业歧视，保障劳动者的平等就业

权利，是我国劳动立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因此，求职者遭遇歧视时可以采取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然而，虽然我国的《宪法》、《劳动法》、《就业促进法》等法律法规都或多或少涉及到反就业歧视问题，但基本上都属于宣告性质，缺乏对歧视行为的制裁、受害者的权利救济等具体规定，导致在程序上和操作上的困难。

一个人想要获得发展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教育机会的平等，二是就业机会的平等。反对歧视、维护每个人的尊严是不可动摇的伦理基石。卫生部明确就业、入学不得歧视乙肝病毒携带者，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勾勒一种可行的法律、制度是易行的，更重要的是如何贯彻落实。只有真正明确企业招聘的法律责任和劳动者救济的权利，让歧视就业者付出代价，才能让五花八门的就业歧视从根本上杜绝。（陆琦）

## 海峰随笔

# 大学校史不应牵强附会

□刘海峰

校庆是纪念学校建立的庆祝活动，校史是对一所学校发展轨迹的真实记录。近年来，高等学校校庆成了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由于校史漫长，往往与一所大学的办学传统和办学水平密切相关，百年或几十年校庆隆重盛大，有利于对学生进行学校传统教育和优良校风教育，也有利于增强校友对母校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有利于吸引更多的社会捐助，因此各高校都希望本校历史越悠久越好，希望校史能够尽量上延。同时，也出现个别高等学校互相攀比校庆年份，不尊重历史，勉强追溯校史，随意更改校庆年份的不良现象。



现在，每年都有许多大学举办隆重的校庆，而且时不时有百年校庆，不少高校已将校史上延到清朝末年的高等学校。有些高校经过自行组织的校史论证，申请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将校史上延，而有的高校则只向本校一些教师略作咨询便自作主张确定校史上延，突然将校庆年份拉长了许多，在教育界和社会上被人们议论纷纷，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因为中国高等学校校史追溯和校庆年份的核定问题相当复杂，以往又没有统一的标准，于是一些高校便自行其是，牵强附会，找些当地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学校作为前身学校。

有些高校在校史追溯和确定校庆年份时随意性太大，将校史勉强上延，这就有如百米赛跑中的抢跑。制定校史确定的标准有如田径比赛必须制定竞赛规则，否则会造成混乱。自1993年个别大学牵强附会地将校史往前延伸举行百年校庆之后，如何科学地确定校史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界的一个问题。2001年以来，我曾主持过河北六所高等学校的百年校史论证，其中也有一所大学试图将没有实质继承关系的清末高校作为前身学校。

现在已经出现个别高等学校刚合并组建1年，因为合并前某一院校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曾有一小部分是从一老牌大学中调整而来，就将校史拉长到100年，并于2002年举办百年校庆。可是在1902年成立的前身学校当时根本就还没开办此一专业。有人比喻这就好像儿子、侄儿、孙子要和爷爷过同岁的大寿，不太合理。

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近现代高等学校聚散离合特别频繁，存亡继续变化多端，构成了一部扑朔迷离、跌宕起伏的中国近现代高等学校变迁史。有的高校前后更名多次甚至十多次，与其他高校校史的关系是“斩不断，理还乱”，因此有的高校的校史追溯非常复杂。

追溯高等学校校史应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既不应缩小，也不能夸大。1976年以前，为了和“封资修”划清界限，一些高等学校曾经出现人为割断历史，不提建国前校史的情况。现在则出现不少高校人为夸大历史，拉长校庆年份情况，甚至出现个别高校生拉硬扯其所前身为前身学校的情况。两者都不是历史唯物论的态度。1990年以后，特别是在当前，主要是防止好大喜功、夸大校史的倾向。

高等学校校史的确，关键是看其校史是否真正具有连续性。而要考察某所学校与其前身学校是否有连续性，校庆年份是否能够确立，则需要考察人员转移、办学层次、办学思想、学校性质等多方面的因素。

校史追溯应考虑学校整体的继承关系，而非个别因素的继承关系，不能只依据学校与其认定的前身学校个别科系的继承关系。在1953年前后院系调整时，有不少新建专业院校是由多所大学调整出的相同科系组合而成的，一般来说应以新组建的时间为建校时间。但若原高等学校的系科和人员成为分立或派生出的高等学校的主体，即达到新设高校师生一半以上，也就是占新建高校人员的多数的，应该可以追溯原高等学校的建校时间。若只是少量系科从另一高校迁转过来，就很难认同将另一学校的创办时间作为这一学校的建校时间。这就好比家族史、家庭年代与本人年龄有所区别一样。

在追溯高等学校校史的各因素中，主要考虑学校的核心因素，而非学校的次要因素。教师、学生和培养目标（包括学校性质和办学层次）是学校的核心因素，校址、校舍、校名等则是学校的次要因素。因此，判断两校是否有继承关系，严格意义上应综合考虑教师、学生、学校性质和办学层次四因素的承接关系，当然该学校主观上是否认同与早先学校具有继承性，也是一个因素。至于校址、校舍因素在校史追溯中只是参考因素，因为在同一校址办学的两所学校未必有继承关系，这好比张家在一座房子里住了10年后搬出，李家接着住进来，两家并无任何血缘关系，李家不会也不应认同张家为其祖宗。

过去，我们对旧中国的高等教育否定的多，肯定的少；批判的多，继承的少，一些高校也以为越革命越好，试图与旧时代彻底决裂，人为地割断校史，确实不对。而今天，如果我们认为高校历史越长越好，校庆年份越早越好，以至一些高校互相攀比，这不是尊重历史追本溯源，而是生拉硬扯某所学校作为前身学校，人为地拉长校史，拉长校庆年份，也不可取，甚至还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从具体历史条件出发，不缩小、不夸大，本着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以可靠的史料进行严肃、严密的校史论证，是要破解这道难题，显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 点评：

袁贵仁能不能如国人所盼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贵人”？他将如何“医治”教育领域累积多年的顽症？我们拭目以待。

## 点评：

调整教育的基本模式，把民间意见纳入教育决策程序，还需要各方进一步的努力。

## 点评：

浙江航模加分事件，“重庆民族生作假事件”等，再一次将现行高考制度的漏洞置于聚光灯下。高考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完善配套政策。既有用于选拔人才，又有利于促进教育公平，是必须遵循的原则。

## 点评：

山东临沂师范学院在招生中，对12名考分上线而综合素质评价低又不愿服从调剂的考生进行了退档处理。在高校录取工作中，这是第一次有高分考生因“综合素质评价低”而被退档，综合素质评价第一次与高考录取实现“硬挂钩”。

## 点评：

2009年10月，北京大学推出“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根据此方案，2010年北大将在北京、天津等13个省(区、市)试行这一制度。招收综合素质优秀或学科特长突出的高中毕业生。按照实施方案，获得北大“推荐资质”的中学校长，可按分配名额推荐优秀学生，总数在北大本科招生计划的3%以内。被推荐、经北大审核合格的学生，可免于参加北大自主招生笔试而直接进入面试。面试合格者享受高考北大录取线下降30分录取的政策。

## 点评：

在有着上千年统一考试历史的国家，正在酝酿如何公平地选拔优秀人才的政策，而是要破解这道难题，显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 点评：

有人指出，在2009年高考中，

## 各方观点：

有人指出，在2009年高考中，

## 各方观点：

有人指出，在2009年高考中，

## 各方观点：

有人指出，在2009年高考中，

## 各方观点：

有人指出，在2009年高考中，

(下转 B4版)

# 袁贵仁：中国教育改革的“贵人”？

□本报记者 袁建胜 孙琛辉 陆琦 陈彬



## 事件回放：

2009年10月的最后一天，全国人大公布了教育部“换帅”的任免决定。任教育部部长长达6年的周济，在他第二个任期即将届满的时候，把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接力棒交给了担任副部长已8年的袁贵仁。

谁是袁贵仁？应该有好多人知道

#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问计于民

## 事件回放：

2009年，一场前所未有的教育问计于民唤起人们对教育的今天与未来的无限思考。1月7日，教育部发布公告，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制定为契机，面向全社会启动第一轮公开征求意见工作。为中国教育勾画未来，为改革发展确定方向，新世纪第一份教育纲领性文件的孕育就这样迅速将全社会关切教育的目光聚集，将百姓热切的期盼点燃。

在2009年9月11日进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时任教育部部长的周济表示，会在合适的时候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文本再一次公布，接受批评建议，共同讨论。



## 事件回放：

2009年高考录取后被媒体揭露的“浙江航模加分事件”、“重庆民族生作假事件”等等，引起公众对改革高考加分政策、保送生政策等的热议。随着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公布的一个民间版的高考制度改革方案，山东高分退档、北京大学试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等措施，由此发出了教育改革的新信号。

绍兴一中2009年参加航海模型加分测试的19名考生中，13名考生的家长分别是越城区副区长、市建行行长、市财政局副局长等，其余6名

这一问题的答案。但这似乎一点也不妨碍人们对袁贵仁的关注和热议。在教育痼疾重重、亟待快刀下手解决的当下，袁贵仁被国人寄予厚望，希望他能根治中国教育存在的种种顽疾，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培养出大批像钱学森一样的杰出人才。人们用他名字的谐音，赋予他一个沉甸甸的使命——期待袁贵仁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贵人”。

袁贵仁的研究领域，从哲学的认识论，发展到价值论，再专注于价值论中的入学——关注的价值是什么以及如何实现——这或许正是目前中国教育的最核心问题。

解读袁贵仁的简历，不难发现，这是一个一生从未离开过教育的部长。1969年至1978年恢复高考，他在安徽省固镇县中学以及五七大学做“教书先生”；1978年后的20余年间，他在北京师范大学求学、任教，先后担任哲学系副主任、社科处处长、常务副校长、党委书记以及校长。在此期间，还兼任过北京市教委主任；

2001年以后的8年间，他进入教育部任副部长，分管招生、财务、党建、纪检等工作。

摆在袁贵仁面前的中国教育痼疾重重：素质教育难以落实，教育公平欠缺，学术造假案频出，高校腐败屡有曝光……袁贵仁接了个“烫手山芋”。

被公众寄予厚望的袁贵仁2009年已经59岁了，按照国家现行部长级官员任职的年龄要求，他在教育部长的位置上可能只有五六年的光阴。要在这么有限的时间里对中国教育来一次彻头彻尾的大换血，太难了。

袁贵仁是最有资格出任部长的。一是在几位副部长中资历最老；二是师范院校毕业，对教育有切身的感受和认识，并长期在一线工作，具有丰富的教育管理经历。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周桂钿对曾经共事多年的袁贵仁评价颇高：“他对中国的教育非常清楚，为人正派、聪明，做事逻辑清楚、有板有眼。”

复旦大学一位熟悉袁贵仁的教授表示，袁贵仁是典型的“学者型”官员。他曾被称为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三面旗帜之一”，还是中国价值理论界和最早在我国开展“入学”研究的学者之一，期待新任部长可以改善综合大学里人文社科类学科的地位。

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为了公开》一书中对这位老领导的评价是：对新闻宣传的指导与部署多少都带有些哲理色彩。

袁贵仁的好友、学生，在为他履新高兴的同时，“跟着就很担忧”：听说老师当了部长，真的是为他捏了一把汗，他是受命于“危难”之时，中国教育的问题确实太复杂，积重难返。

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依靠教育部部长解决一个个具体的问题，并非最佳的教育治理路径。教育体制改革的目标，应该是理顺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关系，也就是办学体制问题。教育改革说到底是一个放权赋权、管理平衡的问题。

另有教育专家表示：一个国家教育改革的成败，与教育部部长息息相关，也同样与他身后的政府和政党密不可分。作为教育部部长的袁贵仁，要推行教育改革，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关键就看其怎么施行了。

袁贵仁能不能如国人所盼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贵人”？他将如何“医治”教育领域累积多年的顽症？我们拭目以待。

调整教育的基本模式，把民间意见纳入教育决策程序，还需要各方进一步的努力。

浙江航模加分事件，“重庆民族生作假事件”等，再一次将现行高考制度的漏洞置于聚光灯下。高考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完善配套政策。既有用于选拔人才，又有利于促进教育公平，是必须遵循的原则。

山东临沂师范学院在招生中，对12名考分上线而综合素质评价低又不愿服从调剂的考生进行了退档处理。在高校录取工作中，这是第一次有高分考生因“综合素质评价低”而被退档，综合素质评价第一次与高考录取实现“硬挂钩”。

2009年10月，北京大学推出“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根据此方案，2010年北大将在北京、天津等13个省(区、市)试行这一制度。招收综合素质优秀或学科特长突出的高中毕业生。按照实施方案，获得北大“推荐资质”的中学校长，可按分配名额推荐优秀学生，总数在北大本科招生计划的3%以内。被推荐、经北大审核合格的学生，可免于参加北大自主招生笔试而直接进入面试。面试合格者享受高考北大录取线下降30分录取的政策。

在有着上千年统一考试历史的国家，正在酝酿如何公平地选拔优秀人才的政策，而是要破解这道难题，显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有人指出，在2009年高考中，

(下转 B4版)



总理所说：只有一流的教育，才有一流的国家实力，才能建设一流国家。本届政府研究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这一指导未来12年教育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袁贵仁的研究领域，从哲学的认识论，发展到价值论，再专注于价值论中的入学——关注的价值是什么以及如何实现——这或许正是目前中国教育的最核心问题。

解读袁贵仁的简历，不难发现，这是一个一生从未离开过教育的部长。1969年至1978年恢复高考，他在安徽省固镇县中学以及五七大学做“教书先生”；1978年后的20余年间，他在北京师范大学求学、任教，先后担任哲学系副主任、社科处处长、常务副校长、党委书记以及校长。在此期间，还兼任过北京市教委主任；

2001年以后的8年间，他进入教育部任副部长，分管招生、财务、党建、纪检等工作。

摆在袁贵仁面前的中国教育痼疾重重：素质教育难以落实，教育公平欠缺，学术造假案频出，高校腐败屡有曝光……袁贵仁接了个“烫手山芋”。

被公众寄予厚望的袁贵仁2009年已经59岁了，按照国家现行部长级官员任职的年龄要求，他在教育部长的位置上可能只有五六年的光阴。要在这么有限的时间里对中国教育来一次彻头彻尾的大换血，太难了。

袁贵仁是最有资格出任部长的。一是在几位副部长中资历最老；二是师范院校毕业，对教育有切身的感受和认识，并长期在一线工作，具有丰富的教育管理经历。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周桂钿对曾经共事多年的袁贵仁评价颇高：“他对中国的教育非常清楚，为人正派、聪明，做事逻辑清楚、有板有眼。”

复旦大学一位熟悉袁贵仁的教授表示，袁贵仁是典型的“学者型”官员。他曾被称为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三面旗帜之一”，还是中国价值理论界和最早在我国开展“入学”研究的学者之一，期待新任部长可以改善综合大学里人文社科类学科的地位。

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为了公开》一书中对这位老领导的评价是：对新闻宣传的指导与部署多少都带有些哲理色彩。

袁贵仁的好友、学生，在为他履新高兴的同时，“跟着就很担忧”：听说老师当了部长，真的是为他捏了一把汗，他是受命于“危难”之时，中国教育的问题确实太复杂，积重难返。

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依靠教育部部长解决一个个具体的问题，并非最佳的教育治理路径。教育体制改革的目标，应该是理顺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关系，也就是办学体制问题。教育改革说到底是一个放权赋权、管理平衡的问题。

(下转 B4版)